



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

Studies on the Ancient Spartan Political System

祝宏俊◎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

Studies on the Ancient Spartan Political System

祝宏俊◎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 / 祝宏俊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117 - 1644 - 6

I. ①古…

II. ①祝…

III. ①斯巴达 - 政治制度史 - 研究

IV. ①D0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8645 号

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5(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 cctphome. com](http://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349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5.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本书部分参考文献缩写对照表

Apol.	Apollodorus, <i>the Library</i>
Arist. <i>Ath. Pol.</i>	Aristotle, <i>Athenian Constitution</i>
Arist. <i>Fr.</i>	Aristotle, <i>Fragments</i>
Arist. <i>Pol.</i>	Aristotle, <i>Politics</i>
Athen.	Athenaeus, <i>The Deipnosophists</i>
Cic.	Cicero
CP	<i>Classical Philology</i>
CQ	<i>the Classical Quarterly</i>
Diod.	Diodorus, <i>The Library of History</i>
FGrHist	<i>the Fragments of Greek History</i>
Hdt	Herodotus, <i>Histories</i>
I. G.	<i>the Inscriptions of Greece</i>
Ild.	Homer, <i>Iliad</i>
Iso. <i>Pan.</i>	Isocrates, <i>Panathenaicus</i>
JHS	<i>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i>
Ody.	Homer, <i>Odyssey</i>
Paus.	Pausanias, <i>Description of Greece</i>
Plato, <i>Rep.</i>	Plato, <i>Republic</i>
Plato, <i>Alcib.</i>	Plato, <i>Alcibiades</i>
Plut. <i>Ages.</i>	Plutarch's <i>Lives</i> , <i>Agesilaus</i>
Plut. <i>Agis</i>	Plutarch's <i>Lives</i> , <i>Agis</i>
Plut. <i>Aristides.</i>	Plutarch's <i>Lives</i> , <i>Aristides</i>
Plut. <i>Cleom.</i>	Plutarch's <i>Lives</i> , <i>Cleomenes</i>
Plut. <i>Lyc.</i>	Plutarch's <i>Lives</i> , <i>Lycurgus</i>

Plut. <i>Lyc & Numa</i>	Plutarch's <i>Lives</i> , <i>Lycurgus & Numa</i>
Plut. <i>Lys.</i>	Plutarch's <i>Lives</i> , <i>Lysander</i>
Plut. <i>Mor.</i>	Plutarch, <i>Moralia</i>
Plut. <i>Pel.</i>	Plutarch's <i>Lives</i> , <i>Pelopidas</i>
Plut. <i>Phocion</i>	Plutarch's <i>Lives</i> , <i>Phocion</i>
Plut. <i>Solon</i>	Plutarch's <i>Lives</i> , <i>Solon</i>
Poly.	Polybius, <i>The Histories</i>
Strabo.	Strabo, <i>Geography</i>
Thuc.	Thucydides, <i>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
Tyr. fr.	Tyrtaeus, <i>Fragments</i>
Xen. <i>Agesilaos</i>	Xenophon, <i>Agesilaos</i>
Xen. <i>Hell.</i>	Xenophon, <i>Hellenica</i>
Xen. <i>Lac. Pol.</i>	Xenophon, <i>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i>

说明：

1. 本书古典文献依据罗易卜古典丛书，文中的版本不再一一列举，可参考书后的参考文献部分。

2. 本书古典文献部分的注释依照国际惯例采用缩写形式，并采用卷、章、段或行标注法，罗马数字表示卷，阿拉伯数字表示章、段或行，如“Hdt. IX. 1.”，“Thu. I. 18.”或“Xen. Hell. I. 2. 3.”，同一卷中的几个并列的段或行，则用逗号隔开，如“Hdt. XV. 234 – 245, 345 – 357.”，“Hdt. IX. 1, 2, 3, 4.”，如果三级标注中出现同卷不同章、段，则全部标注出来，用分号隔开，如“Xen. Hell. I. 2. 3; I. 4. 5.”；如出现同卷同章不同段的情况，则用逗号隔开端落数字，如“Xen. Hell. I. 4. 5, 6.”

序 一

王敦书

城邦是古希腊的基本政治单位，也是研究希腊史乃至世界古代史的重要的切入点。丹麦著名古典学者摩恩·汉森及其主持的哥本哈根城邦研究中心正是从这个切入点，联合世界各国学者，在古希腊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在林志纯先生带领下，曾经对古代世界的城邦开展过广泛研究，那可以说是国内城邦研究的巅峰时期，其代表作是日知（林志纯先生的笔名）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这次研究更多的是对古代城邦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强调城邦的普遍性，并将它推广应用于古代埃及、西亚、南亚与中国；但对古希腊城邦的研究略显不足，这与古希腊城邦在整个城邦问题研究中的地位似乎不太相称，而且没有涉及斯巴达城邦。

在古希腊城邦中，雅典和斯巴达无疑是两个最重要的城邦。但雅典因为资料相对于后者更为丰富，加之，古代雅典曾经的民主政治比较繁荣，这一遗产与现代西方主流意识相契合，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再者，古希腊文化主要借助于雅典作家的作品而留传至今，其他地区的作品或因为产量较少，或由于存世稀缺，因此，对古希腊文化的研究尽管戴着古希腊的“头衔”，也更多反映了雅典的特色。相对而言，对雅典的研究要比对斯巴达的丰富得多。这种研究格局与斯巴达在古希腊的国际地位、政治地位乃至文化地位有点不相匹配。斯巴达从公元前 6 世纪中期开始通过缔结“伯罗奔尼撒同盟”，执希腊半岛之牛耳，直至公元前 5 世纪 70 年代中期。其后雅典取代斯巴达成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城邦，但半个世纪之后，斯巴达得到波斯帮助，再次超越雅典，直至公元前 4 世纪 80 年代。此后，尽管有底比斯、雅典等邦短期称雄，但其实力实际上已经与过去的雅典、斯巴达不可同日而语。可见，斯巴达在更长的时间内

是希腊世界的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城邦。斯巴达的成功使得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也引起了希腊各国，尤其是雅典知识分子的关注。这其中又以柏拉图与色诺芬为最。斯巴达成为柏拉图现实版“理想国”的雏形；色诺芬则投靠斯巴达，写下了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传》及《斯巴达政制》两部作品。过去，一般认为斯巴达的文化不发达。其实，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前斯巴达的诗歌、艺术、建筑、雕刻、陶器制作等还是相当昌盛的。至于众口流传的所谓斯巴达人的传统精神，这更是值得人们玩味探讨的。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古典学与古代史学界以英国为代表，充分利用不列颠雅典学院在斯巴达及拉科尼亚地区长期考古发掘与勘察的成果，加强了斯巴达研究，人才辈出，作品纷呈，琳琅满目。例如，K. M. T. 克莱姆斯的《古代斯巴达：一个对证据的再考察》（1949），G. L. 赫胥黎的《早期斯巴达》（1962），A. H. M. 琼斯的《斯巴达》（1967），W. G. 弗勒斯特的《公元前950—192年斯巴达史》（1968），E. 劳逊的《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1969），D. M. 路易斯的《斯巴达与波斯》（1977），J. T. 胡克的《古代斯巴达人》（1980），C. A. 包威尔主编的《古典斯巴达：在她成功背后的技术》（1989），C. A. 包威尔与S. 霍德金森合编的《斯巴达的影子》（1994）等专著。著名学者M. I. 芬利1968年在法国发表的《斯巴达》论文，以及牛津马克思主义史家德·圣·克鲁瓦院士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1972）中关于斯巴达的论述，对英国乃至国际的斯巴达研究都有重要的影响。

当代英国最著名的二位斯巴达史权威是保罗·卡特勒治与斯蒂芬·霍德金森。卡特勒治1975年发表《朝向斯巴达革命》论文，崭露头角；1979年出版《斯巴达与拉科尼亚：一部公元前1300—362年地区史》，一举成名。其后，接连出版《阿格西劳斯与斯巴达危机》（1987）与《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的斯巴达：双城记》（1991，与A. J. S. 斯泡弗思合著）等专著及多篇论文。霍德金森1983年发表论文《古典斯巴达的社会秩序与价值冲突》，脱颖而出。其后，接连发表斯巴达社会经济史领域论文多篇，如《古典斯巴达的土地制度与财产继承》、《继承、婚姻与人口统计学：古典斯巴达盛衰的透视》、《公元前4世纪的斯巴达社会：危机与持续》等，并与包威尔合编《斯巴达的影子》一书。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先后分别召开了关于斯巴达的艺术、考古与历史的三次国际学术

研讨会。1997年9月举行的关于斯巴达历史的国际会议盛况空前，会议代表来自四大洲十二个国家，其成果由霍德金森与包威尔共同主编，以“斯巴达的新透视”为名于1999年出版，扉页题写“献给乔弗雷·德·圣·克鲁瓦”。2000年新世纪伊始，霍德金森马不停蹄，立刻出版大部头专著《古典斯巴达的财产与财富》。卡特勒治再接再厉，2001年将其以往发表的斯巴达论文修订集成专著《斯巴达反思》出版；2002至2004年又将自己三十年来研究斯巴达之心得精华提炼凝聚成《斯巴达人》一书普及世界发行。这一切预示着斯巴达研究在21世纪将有新的发展。

19世纪后期西学逐渐传入中国后，国人才开始知道斯巴达的名字。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内学者关于斯巴达的研究大致上始于黑劳士问题。这一研究是在社会形态问题争论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改革开放后，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在《世界古代史论丛》发表长篇重要力作《论黑劳士制度》。这原是他1957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代史研究班研修时的毕业论文，受到苏联专家与林志纯的指导与好评，经过二十多年的进一步思考锤炼而后正式公开问世，乃我国斯巴达研究的开山奠基之作。可惜，刘先生以后专心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史，未把斯巴达研究继续下去。在刘先生的启发下，1983年我利用在希腊雅典访学的机会与图书条件，写了《斯巴达早期土地制度考》一文，提交给该年5月在河南郑州大学召开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年末在《历史研究》发表。可是，以后我虽继续关注国内外斯巴达研究的状况，却未再写这方面的文章。

祝君宏俊毕业于扬州大学（原扬州师范学院），少年英俊，聪颖勤奋，严谨治学。后为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专攻古希腊史，由郭小凌先生任导师，亦受教于刘家和先生。虽其博士学位论文乃关于古希腊的伦理思想方面，但他已开始关心及从事斯巴达研究。2004年荣获博士学位后，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我合作，集中精力进行斯巴达史博士后研究。不久，他的第一篇论文《斯巴达的“监察官”》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可谓一炮打响。2006年，他从南开大学出站，又得于沛先生垂爱，进入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继续从事斯巴达研究。2008年上半年，他到英国诺丁汉大学古典学系“斯巴达与伯罗奔尼撒研究中心”访学，得到霍德金森的指导。至今，宏俊在这一领域

研究已经十余年，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我作为他在南开的博士后合作指导老师，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目前出版的这部著作就是在南开大学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成的，当时的出站报告主要研究了中央政权机构，现在的成果则增加了斯巴达的地方管理部分，这样构成了对斯巴达政治制度更为全面的研究。尽管书中的某些观点还可以继续探讨，继续研究，她无疑是我国关于斯巴达研究的第一部重要专著，对我国的世界古代史、古希腊史研究也很有意义。我国的斯巴达研究有厚望焉！

是为序。

序 二

郭小凌

这是迄今国内学界对斯巴达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体系所进行的相对最为深入具体研究的一本书，是我国古典学在近三十多年不断取得进步的又一明证。

斯巴达在世界史上颇为特殊。它是希腊诸邦中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具有公民特权的男性却在最多的时候不到一万人，较其他大邦的公民集体规模要小许多。但这并不是令人对斯巴达感到特殊的主要地方。许多人还注意到斯巴达人对为数众多的耕奴希洛人以及非公民自由人庇里阿西人的统治与压迫，但在世界历史长河中，这种一个公民公社对另一个或若干个被征服族群的统治可谓屡见不鲜。斯巴达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平均主义的公有制，在此基础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是公民基本平等参与的共和制，即斯巴达人自诩的“平等者公社”制。这一切表现在莱库古改革之后，公民集体内部缺乏大宗的私有动产与不动产，国家拥有公民田产与奴隶的所有权，公民社会的男性成员无论贵族与平民，均享有基本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土地与奴隶的占有权以及强制性的军训权利，所有公民的个人生活都要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与监督，包括公共食堂与家庭生活。这样一种集权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制度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证了斯巴达公民社会的长期团结与稳定，且稳定的长度超过古希腊任何其他国家。也因为内部稳定，并长期进行专业化的训练，尽管斯巴达公民兵人数不多，却成就了一支打遍希腊世界无敌手的强大陆军。在公元前 146 年希腊被罗马征服之前，斯巴达可谓希腊世界诸邦中称霸时间最长、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国家。

由于斯巴达表现出来的多方面优势，当公元前 4 世纪希腊世界面临

内外交困的形势时，公元前2世纪罗马军团席卷地中海世界时，希腊世界的那些为天下之忧而忧的知识分子们，如苏格拉底、伊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乌斯等人，便纷纷把斯巴达的政治体制看作是振兴城邦和罗马成功的样板。他们的众多分析与价值评判，使得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在古代世界的政治学领域成为好政体的典型。相反，对古代民主制，古希腊那些最睿智的学者却多持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对于这样一个颇值得玩味的国家，我国学界给以的注意力似乎远远不够。“文革”前只有刘家 and 先生就希洛制的起源与属性有过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论证。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古典学领域欠账太多，30年里只有极少数论著涉及斯巴达史的某个方面，光焰四射的雅典与罗马吸引了我国大部分学者的学术旨趣。而在国外，特别是在欧美学界，多半是因现今流行的价值观，对实行军国主义、平等主义的斯巴达也并不在意，有关专著的数量远不能同有关雅典的专著数量相比，反映了西方古希腊史家的价值取向。鉴于此，祝宏俊博士的这部专著便有了填补缺口的意义。

就我所知，作者是在本世纪初转向斯巴达史研究的。此前，作者在梳理古希腊思想史的过程中，敏锐地察觉斯巴达对古希腊思想家的影响，遂生出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的冲动。后来他两度从事博士后研究，把念头付诸实践，对斯巴达史展开较为全面的考察。再后，他有幸先后赴英国、美国访学，收集到许多相关史料，掌握了有关问题的最新学术动态，带着问题走访过国际古典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卡特里奇、霍德金森等教授。一份付出带来一份收获。近些年来，作者在斯巴达研究方面接连发表一些颇具分量的论作，这本书显然是已有过程的继续，汇集了作者的最新研究心得。

我观宏俊博士的斯巴达研究，感觉至少有两个方面颇具特色，具有启发意义。首先是他的从个别到一般的研究方法。这并不是什么新颖的方法（古希腊最渊博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研究就十分成功地采用了这种方法），但却是被当代许多学人忽略的方法。在历年刊行的史学论文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题目很大，结论很大，支持结论的具体事实却很薄弱。或者换句话说，作者并没有搞清复杂的细节，庞大的结论往往基于粗浅的一般描述，从而简单化了复杂的历史事物。而本书作者却从有关斯巴达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入手，如埃伏尔制度、公民大会制度、阿卡伽塔伊制度、长老会议制度之类中央权力体制，以及

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海外殖民地、附属国的管理制度，包括职官制度等等，把每一制度都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穷根究底到史料的局限使进一步的分解不再可能为止。然后再进行每个局部问题的归纳。这就使有关斯巴达政制的整个综合有了相对可靠的依据。其次是注重局部与整体的有机联系。本书的基本架构虽是专题研究，但在每个专题内部却突出整体史的叙事方式，尽量把斯巴达建国至国家被罗马征服之间的每一单个的历史进程同整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结合在一起。

在这种深入细致的考析下，作者能够从一些既定史料中找到一些新的解释。例如对斯巴达的国王制度，以往学界主要强调“双国王”的特征，但本书作者却指出，在斯巴达实行一夫多妻的制度下，王位继承不仅要符合血统纯正、长幼有序的原则，还要符合王统原则，即继承人应该是父亲担任国王期间所生。又如，在斯巴达的地方管理方面，作者认为传统所说的公餐团制度、秘密警察制度等兼具行政管理的功能。如果不是细致爬梳与推敲史料，这样具体的结论是不可能归纳出来的。

关于斯巴达政治中的民主成分问题古今都有人进行过讨论，本书作者则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认为，斯巴达中央政权分为阿卡伽塔伊制度（即国王制度）、长老会议、埃伏尔制度（即监察官）、公民大会四个主要权力机构。前两者为一组，主要代表贵族；后两者为一组，主要代表平民。四个机构之间并无明显的依附关系，基本处于独立状态。同时四个权力机构所掌握的职权有明显差别，国王主要掌握军权和宗教权，长老会议主要拥有提案权，但议案大多由国王提交公民大会，监察官主要负监督权，公民大会的权力主要在于审议、表决法案。而斯巴达公民集中居住在斯巴达几个邻近的村落中，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方便。所有这一切产生出斯巴达特殊的民主表现：（1）政治的代表性更为广泛，斯巴达人不分平民贵族可直接参政，尤其是贵族和平民均可利用自己掌控的权力机构发出声音，这与古典作家所批评的雅典平民专政，即简单多数的暴民政治，有明显区别。（2）政治分权，斯巴达有四个主要权力机构，各个权力机构的职权存在区别，同时又分掌在不同的阶级手中，所以，斯巴达政治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分权与制衡，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够维持这种权力的平衡。个中原因还待作者的进一步研究。

当然，这部著作的有些结论还存在可商榷之处，某些史料的似是而

非致使推导出的看法并非完全令人信服。但世界上哪里有没有瑕疵的著作呢？无论如何，作为我国第一部斯巴达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专著，祝宏俊博士的这本新作丰富了我国的古希腊史研究，为今后其他学者的斯巴达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参照。作为他曾经的老师和现在的同事，我为作者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祝宏俊博士曾多次表示，他的研究不只到斯巴达即止，而是把斯巴达研究当作深入认识希腊城邦史的起点，将逐一古希腊的代表性城邦展开个案研究。我祝他在这一正确方向上持之以恒，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前 言

斯巴达是古希腊与雅典并立的两个重要城邦，但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过程却与雅典有着很大的区别。雅典的政制经过了王政、贵族政治、僭主政治、民主政治、寡头政治等多种形式，而斯巴达政制却长期保持稳定，从传说中的莱库古改革，斯巴达政制初步建立起来，直至公元前4世纪较少发生重大的政治变革，即使到了罗马统治时期，斯巴达仍然保持了较多的传统制度。这一点在古代就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如希罗多德认为斯巴达在莱库古改革之后就一直享有“良好的制度”^①，修昔底德指出：斯巴达政治制度是高度稳定的制度，它历经400年未变^②，后来普鲁塔克则称其制度500年未变^③，西塞罗甚至称700年不变^④。笔者并不同意古典作家“长期不变”的观点，但“长期稳定，较少变革”确实是斯巴达政治发展史的特征。斯巴达稳定型的政治体制是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初步建立起来，后经不断地补充完善最终形成。正是这样一种稳定的制度带来了斯巴达近两个世纪（从公元前6世纪后期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强盛。至公元前4世纪中期，斯巴达迅速衰落。这种衰落有多种原因，但政治体制乃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对斯巴达政治体制的研究是我们认识斯巴达历史兴衰的关键。

斯巴达的强盛以及支撑这种强盛的政治制度引起了古代思想家的极大关注。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斯多亚派、波利比乌斯、西塞罗、普鲁塔克等都曾经对斯巴达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柏拉图

① Hdt. I. 66.

② Thuc. I. 18.

③ Plut. Ly. 29.

④ Cic. *Flacc.* 63, *Tusc.* 2. 34.

在《理想国》、《法律篇》中关于第二等国家、法治国家的大量阐述受到斯巴达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西塞罗则主要依据斯巴达的政治模式提出了混合政体（或共和政体、公民政体）的思想。受斯巴达的影响，柏拉图、斯多亚派提出了共产共妻的乌托邦思想。色诺芬、普鲁塔克、亚里士多德则将斯巴达强盛的原因主要归结为道德和习俗。尽管古典作家的分析大多侧重于一个或几个侧面，未能进行较全面的分析，但他们却开启了斯巴达政治制度研究的先河。

然而，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学术界对这两个旗鼓相当的城邦却显现出明显的厚此薄彼，对斯巴达的重视程度远逊于雅典。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当今学术研究的整体氛围使然。当今世界，自由、民主成为主流价值观，受此影响，具有较多自由、民主色彩的雅典政制自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斯巴达政制在某一历史时期具有整体主义和军国主义色彩，这一特征又为现代被纳粹法西斯有意利用，因此，人们往往在潜意识中将其等同于专制、极权、独裁，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斯巴达的研究。相对于雅典的研究成果，斯巴达的研究可谓小巫见大巫。更有甚者，国际学术界在一段时间内还存在一股人为否定斯巴达的倾向。^①

第二个原因是斯巴达的史料相对缺乏。关于古希腊史研究的资料大致上可以分为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在我们研究的这段历史时期内（主要是古风、古典时期），古代斯巴达留下来的公共建筑、神庙祭坛、陶器器皿等考古资料相对较少。正如修昔低德所言，古典时期的斯巴达是若干个乡村的组合，没有宏伟的神庙和公共建筑物。^② 相对于这些实物，对政治制度研究更重要的铭文资料几近空白。尽管关于斯巴达历史文献材料的情况略好于考古资料，但情况仍不能令人满意，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及雅典。我们既没有《雅典政制》那样内容较为丰富且直接关乎政治制度的历史文献，也没有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梯尼、尼西阿斯等当时人留下的数量众多且与政治制度相关的演说词。尽管相对于其他（不包括雅典）城邦，我们拥有的资料相对较多，但这些有限的资料又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他们不是来自斯巴达内部，而是来自雅典等其他

① 参见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2—203，327—328页。

② Thuc. I. 10.

城邦（主要是雅典）和罗马作家。雅典作家大多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4世纪，当时雅典、斯巴达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出于战争中的需要，雅典作家要想获取斯巴达资料比较困难。此外，由于雅典与斯巴达的矛盾，这些雅典作家很难客观公正地叙述斯巴达的历史。罗马作家尽管相对于我们距离斯巴达的历史更近，但一方面他们的资料主要来自希腊文献，而希腊文献又主要来自斯巴达之外；另一方面，罗马作家毕竟生活在数百年之后，由于战争和社会动荡，希腊文献实际上已经残缺不全了，同时罗马作家的写作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文化氛围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使得关于斯巴达历史的文献资料的可信度大大降低。^① 这些文献资料的先天不足自然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也限制了以追求历史真实为目的的史学工作者的学术兴趣。

主要由于上述原因，近代以来直到“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古代斯巴达的政治制度研究一直没有重大突破，他们一方面延续古典作家关于斯巴达政治制度僵化不变的传统观点，另一方面认为斯巴达政制的基本特征是寡头制、极权制、整体主义（totalism）。

但是，“二战”之后，部分西方学者开始摆脱传统观点的窠臼，重新反思斯巴达的历史。这股反思潮流其实在“二战”之前就开始了，如法国学者奥列尔（Ollier）在1933年出版了《斯巴达的幻像》一书^②，在这本书中奥列尔指出：传统的斯巴达的学术形象被人为扭曲了，这或者是斯巴达人自己有意为之，但更主要的是那些非斯巴达人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人为扭曲的，这种扭曲掩饰了对当时斯巴达形象的描述。“二战”之后，这种建立在史料批评基础上的反思继续向前发展。如克里姆斯的《古代斯巴达》借助考古资料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斯巴达的历史进行反思^③，提尔格斯泰德的《古典时期的斯巴达传说》、劳逊的《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帕韦尔和霍德金森合著的《斯巴达的影像》、帕韦尔和沃顿的《幻想背后的斯巴达》，则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分析我们习以为常的斯巴达“印象”是如何形成的，从而引导人们摆脱旧意识形态的束缚，建构更为真实的斯巴达史。

① C. G. Starr, “The Credibility of Early Sparta History”, *Historia* 14, 1965, 257–72.

② F. Ollier, *Le Mirage Spartae: Étude sur l'idéalisation de Sparte dans l'antiquité l'origine jusqu'aux Cyniques*, Paris: de Boccard, 1933.

③ K. M. T. Chrimes, *Ancient Spart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2.